

五卷本《刘子》和日本 古代学者的论述

林其铤 陈凤金

自从拙作《论〈刘子〉作者问题》（载《文献》总20期）和《刘子集校（附作者考辨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）刊布以来，承蒙海内外学者的关注，在1986年4月于安徽屯溪召开的“中国《文心雕龙》学会第二届年会”上，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。有的认为：“研究《刘子》，对研究《文心雕龙》和刘勰思想，有重要的帮助”，“结合《刘子》来探索《文心》，正是把文心雕龙研究深入开展下去的一个重要途径”。但也有的担心：“（《刘子》）如其非刘勰所著，而是张冠李戴，就会把已经相当复杂的刘勰思想研究搅成一锅混汤。”（见《语文导报》1986年第8期《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述要》）分歧的焦点仍是《刘子》作者谁属的问题。1986年7月，日本著名“龙学”家，九州大学户田浩晓教授来信，除了对拙作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之外，还特别示知：“我手头有宝历八年（1758）刊的《刘子全书》五册，在皆川淇园作的《序》里断定，‘《刘子》刘勰所作’。在日本，自古以来便力倡刘勰作者说。”与此同时，又承胡道静先生函示：在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杂家”中有“刘子十·刘子五·刘子三”的著录。据胡先生说：“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撰于日本宽平年代（889—897），相当我国唐昭宗初、中年代。这是说，唐时日本的书籍中，有三部《刘子》，一部为十卷，一部为五卷，又一部为三卷。”因此，我们迫切想知道日本藏的《刘子》

版本和日本学者关于《刘子》及其作者的论述。事也正巧，恰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沈祖炜同志，应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邀，赴东京都参加研究工作，特此托他代为查找。沈祖炜同志花费了大量时间，查阅了东洋文库、静嘉堂文库、帝国图书馆和内阁文库关于《刘子》的藏本。查阅的结果发现，除了藏有我国已有的明刻《子汇》本、孙钊评本以及清刻《子书百家》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之外，还发现一种在我国已经佚传了的五卷本《刘子》。

关于五卷本《刘子》，在我国史有明录。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杂家类有“《刘子》五卷”。明人陈仁锡评选的《诸子奇赏·刘子杂篇》亦出自五卷本，但仅“节取其清新粹美者”二十九篇，且有删节，故未能见其全貌。邵懿辰在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云：“朱修伯曰：‘《晁志》称是书（按：指《刘子》）五卷。（按：《晁志》云‘《刘子》三卷’。因此《晁志》当是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之误。）’。尝校核各本《子汇》，与《道藏》本略同，颇可正程氏（按：程荣本）何氏（按：何允中本）之谬；后检《诸子奇赏》是五卷本，校之果是善本，因知五卷本明末尚有流传也。”由此可见，《刘子》在历史上确有五卷本的流传，只是在明清之际佚传了。据沈祖炜同志所见，日本内阁文库（原在皇宫内）藏的五卷本《刘子》，已重裱过，封面已佚，留有“新雕刘子”的扉页，正文五十五篇，目录篇次与我国现藏《刘子》同，只是分卷有异，每卷十一篇。卷前有日本古代学者播磨清绚和平安咸愿（即咸伯恭）分别作的《刘子序》，卷后有城南滕璋作的《书〈刘子〉后》，两序一跋全系文言文。书末有“宝历八年戊寅孟春谷旦，皇都书肆，西村平八、山田三郎兵卫梓行”的题署。正文首页款式：首行顶格题“新雕刘子卷一”，次行下署“梁刘勰著，第三行署“唐袁孝政注”。双行夹注，假名训点，眉栏校订文字。据平安咸愿《序》称：“丁丑冬（按：日

本宝历七年，1757），京师之刻《刘子》者，广索异本，得应永写本，就予校之。明版诸本，注皆阙者，此独岿然；余既哀乎其遗文，而惜其所以存也，乃正其误讹，而疑者阙焉。”城南滕璋《书〈刘子〉后》亦云：“洛人刻《刘子》者，请校余友咸伯恭，伯恭用应永写本，讎对勘正而付梓矣……而其写本者，复藏诸营庙书府，以存其旧云。”由此可见，宝历八年《新雕刘子》，是在“广索异本”的基础上，选择了来自“营庙书府”（可能是寺庙藏书）的“应永写本”为底本、并经平安咸愿与他本进行“讎对勘正”之后“付梓”的。这些事实也表明：《刘子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广被流传，自唐以降，也在日本广被流传。

播磨清绚、平安咸愿和城南滕璋的序跋，不仅记录了五卷本《新雕刘子》版本依据和开雕缘由，而且对《刘子》的思想内容和《刘子》作者也颇有研究。播磨清绚从“文之污隆，以其代污隆”，即文章源于社会，反映时代风尚这一基本观点出发，阐明了中国六朝时期“骛巧逞丽”的文风正是“江左诸主，脂粉弄容，身同妇女”，“慕虚名、崇缙礼，政与文衰”现实的反映，是“气运之使然”。他认为：《刘子》“取熔《淮南》，自铸其奇，即辞胜掩理；推诸其时，无怪耳！”就是说：从《刘子》的文风上看，是同南朝的时代风尚合拍的。平安咸愿也指出：“《刘子》，杂家者流。其论无所不有，曷不可传也！昔者，不韦聚客而《吕览》作，淮南招士《鸿烈》出焉！此二书其文踳驳不一，世且传之而不倦矣。《刘子》虽作乎后世，其综覈众理发于独虑，猎集群语成于一己，文已佚丽，义又融贯，其连类比物之间，宁无可观者哉！余是以取之云。”

应该说，播磨清绚和平安咸愿对《刘子》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的分析是颇为精辟的。“自铸其奇”，“综覈众理发于独虑，猎集群语成于一己”，道出了《刘子》一书的特色，这也正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阐发的“虽取熔经意，亦自铸伟辞”（《辨

骚篇》），“论也者，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”（《论说篇》）的具体实践。特别值得重视的是，他们二人都把《刘子》的思想渊源同《淮南鸿烈》和《吕氏春秋》相联系。如果我们细察《文心雕龙》和《刘子》，并且把二书的取材、观点同《淮南》和《吕览》加以比较研究，那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从而也可足证日本古代学者的卓见。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将《文心雕龙》和《刘子》同置于“杂家”类，也是自有其见解的。

关于《刘子》的作者问题，日本古代学者都肯定《刘子》是梁刘勰所作。皆川淇园《序》断定：“《刘子》刘勰所作”（据户田浩晓先生信），播磨清绚亦肯定“《刘子》刘勰所作”。平安咸愿也以为：“盖郑樵作《通志》，高似孙作《子略》，并取勰之作也。以二子之博洽而莫之议也，从之为善！”他们之所以肯定刘勰，一方面是根据《刘子》的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，另方面也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对《刘子》的研究和著录。

日本古代学者对于《刘子》的评价是比较高的，他们把《刘子》同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鸿烈》并列，肯定其有“可观者”；认为虽然有南朝共有的“辞胜掩理”的倾向，但“亦可以充取材助博，简在其人，乃亡（无）伤于骈丽”。城南滕璋还从“读诸子百家，言虽异，总之不离乎道也”，“譬之得兔而忘蹄，深造以道，则左右逢原（源）”的角度，肯定亦可择《刘子》以见道。在平安咸愿看来，既然《吕览》、《鸿烈》“世且传之而不倦”，《刘子》自然也可以与其并传于世了。

总之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日本古代学者对《刘子》及其作者问题的研究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《刘子》，考辨《刘子》作者之谁属，是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

《电影·电视·文学》编辑部